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0.04.016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新文化运动

杨世海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办学期间, 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 该月刊是“学衡派”同人刊物, 办刊宗旨与学衡派价值追求一脉相承, 继续坚持在现代语境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 月刊在与“五四新文化派”的对话与沟通中, 开始对日益泛滥的科学主义进行审视, 主张科学人文化。月刊在科学时代对人文价值的追寻与坚守, 极具前瞻性; 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在今天也颇具启示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思想与时代》月刊; 新文化运动; 科学人文化; 科学主义; 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0)04-0118-07

引用格式: 杨世海.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新文化运动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4): 118-124.

Thoughts and Times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YANG Shiha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Zhejiang University moved to Guizhou to run a school, and founded the monthly magazine *Thoughts and Times*, which is a fan publication of Xueheng School. The purpose of running the magazine is in line with the value pursuit of Xueheng School, and it continues to explore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 in the modern context. What is more commendable is that in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School, *Thoughts and Times* began to examine the increasingly rampant scientism and advocated the humanization of science. It pursues and adheres to the humanistic value in the scientific era, which is very forward-looking; Its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is also quite enlightening and valuable today.

Keywords: *Thoughts and Times*; New Culture Movement; humanization of science; scientism; humanistic value

受抗战时局影响, 1940年2月, 国立浙江大学 浙大教授连同昆明、成都、乐山、重庆等地学者
学辗转内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办学, 是年10月, 组成《思想与时代》学社; 次年8月, 出版《思

收稿日期: 2020-04-08

基金项目: 贵州省社科规划课题“《思想与时代》月刊及其学人群研究”(17GZYB39)

作者简介: 杨世海(1980—), 男, 湖南芷江人, 贵州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学文化关系及其比较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

想与时代》月刊，持续8年（1941—1948年），共出版53期，刊登353篇文章，是当时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一份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学社核心成员是张其昀、张荫麟、郭斌龢、钱穆、贺麟、朱光潜6人，二张、郭、贺都是“学衡派”成员，月刊与学衡派价值追求一脉相承，“是‘学衡派’成员和一部分外围成员的同人刊物”^[1]。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但经过二三十年的时代洗礼，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和相关人士的态度如何，是饶有趣味、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拟就此进行研究。

一 《思想与时代》月刊的价值追求及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思想与时代》月刊由张其昀和张荫麟发起，得到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大力支持，当时学人也纷纷响应，月刊撰稿作者多达114人。除学社6位核心成员外，竺可桢、丰子恺、冯友兰、唐君毅、熊十力、谢幼伟等当时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亦纷纷为其撰稿。时值抗战，《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办仓促，刊物没有发刊词。抗战结束后，浙江大学返回杭州，1947年1月，月刊在中断一年多后复刊，主编张其昀在《复刊辞》中有如下说法：“就过去几年的工作看来，本刊显然悬有一个目标，简言之，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具体来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2]月刊“融贯新旧，沟通文质”的追求是学衡派追求的延续：“梅光迪、张荫麟、钱穆诸教授倡导人文主义，一以发扬传统文化之精神，一以吸收西方科技之新知，欲上承南高、东大诸教授创办《学衡》杂志之宗旨，以救世而济民。”^[3]张其昀也说该杂志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4]。显然，《思想与时代》月刊与学衡派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他们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研究，寻找抗战建国的文化资源，在现代语境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同时，他们在科学时代坚持对人文价值的追寻，其实质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上面提到了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态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学衡派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对立

面，正如有论者指出，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逆流”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他们不是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反对新文化运动主流的一些具体方式和主张，如他们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理解就与新文化运动主流的理解差异极大^[5]。实际上，学衡派文人在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建构上是有特殊贡献的^[6]。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二三十年的时代洗礼，学衡派同人虽仍然坚守和延续其之前的文化主张，但其思想也呈现了一些变化，这在《思想与时代》学社的集结和月刊的出版中有充分体现。

首先，学社吸纳了新文化派阵营人员，其核心社员就有朱光潜。朱光潜并非学衡同人，他与新文化运动主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梁宗岱、沈从文等人相交甚密，为京派代表人物，其学术范式与文学旨趣也都是新文化类型的，是典型的“五四新文化派”人物。学社把朱光潜发展为核心社员，可见其中的变化和包容性。其次，月刊刊有“五四新文化派”人物的文章，其中，朱光潜有5篇（《政与教》《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谈价值意识》《克罗齐与新唯心主义》（上、下）），丰子恺有1篇（《绘画改良论》），陈梦家有1篇（《评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第一册〉》）。从内容来看，这些文章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有对西方思想、理论的介绍，也有对五四以来新文化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一文通篇用“他们”来指代儒家，这一指称实际显示了朱光潜与月刊旨趣的距离，也颇能说明《思想与时代》月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再次，月刊全面采用白话文，放弃了学衡时代坚守文言的主张，显示了其顺应时代发展的改变。

当然，学衡同人“这个文学知识分子群体并没有随着《学衡》杂志的停刊而放弃自己的文学——文化立场，其中多数更没有改变自己的上述立场并归依到新文学阵营”^[7]。《思想与时代》学社的集结和月刊的出版，是学衡同人再次聚首，月刊文章继承了“学衡”精神，也就很自然地会提到新文化运动。张荫麟在《论传统历史哲学》就提及“新文化运动”，以之作为在社会文化变迁中，本土文化受外来影响及面临社会危机时应变措施的一个案例^[8]。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

刊登在月刊第一期,该文通常被视作“现代新儒家”的宣言书,文中说:“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这一议论直接针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潮流而发,但贺麟并不是以此来否定新文化运动,相反,他认为这是儒家发展的转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现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他进而肯定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新文化运动之最大贡献,在破坏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他们洗刷扫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接着,贺麟还肯定了胡适的策略和方式:“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策略,据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9]在贺麟看来,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正是新儒学发展的契机。

的确,新文化运动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意味,《思想与时代》月刊延续了学衡派的态度,对此有异议。他们珍视传统的价值,贺麟提倡儒学的新发展原因也在于此。张其昀《时代观念之认识》也说:“一国之民族性虽非一成不易,然有其历久不变之点,一面有不断之创造,一面有传统之典型。凡历史愈长之民族性,其内容亦愈经久而坚实。民族复兴之说即以此为根据。历史有绵延性,现在之中包含过去之潜势力。历史又有累积性,每一刹那,均有新成分之加入,现在决不同于过去。吾人不能恢复过去,亦不能取消过去,而为继续过去。”^[10]在其政论文《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他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宪法之生命,植基于一国固有之思想,纲纪或礼义为中国传统之精神,而亦合于世界最新之思潮。……外国之政治思想固可供他山之助,然新中国之建设与新宪法之实行,其最大之动力,仍为我数千年来巍然独立之民族

精神,舍此无他道也。”^[11]由此,他在该文中详细讨论了如何把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宪政结合起来的方式和途径。钱穆也是如此,他在《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一文中梳理中西交流历史的过程时,影射了新文化运动的偏激:“在不久以前,中国知识界里颇有一辈人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破坏了,如此始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12]^[34]钱穆是坚定的传统文化论者,他一直积极倡扬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一些人因此对西方文明产生了“信仰危机”,西方中心论思想动摇,并希冀以东方文化匡救西方文化。此时,钱穆倡扬传统文化价值显得更有底气,他表现得也特别自信。钱穆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救世良方,希望通过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来增强民族自信,争取抗战胜利;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救中国,还要救世界。

新文化运动高举的科学民主大旗,之后成为社会共识,学衡派同人对此并无异议,《思想与时代》月刊也同样高度重视民主与科学。张其昀《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一文讨论的就是民主话题,只不过他强调中国民主宪政之路要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相适应。张其昀的另外一文《论现代精神》则极为重视科学。他认为,科学及科学精神的发展是现代精神变迁的基本内容。卢于道《科学与政治》一文显示,科学与民主已经深入人心,他视二战为民主阵线与极权阵线的斗争,中国是民主阵营的重要力量,中国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卢于道还认为,科学要为现代民主政治在物质和文化上作出贡献,科学要为反种族主义,要为“人各生而平等”作阐释说明。他说:“科学研究是表示个人自由发展,而研究所以贡献于政治事业是表示科学家在组织下之行动,这才是我们所希望于民主政治下之科学家。”^[13]即便是在讨论传统之学,论者也会与科学联系。如缪钺《论荀学》一文就说:“荀子为人,盖理智发达,注重事实,近于科学而远于玄学,喜逻辑之思辨,乏诗意之想像。”^[14]这充分证明了科学在当时人们意识中的中心地位。钱穆在文中也积极讨论科学:“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渐渐懂得把全部西方

文化分析解剖，再来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比量，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渐渐觉得西方文化所最超出于中国，而为中国固有文化机构里所最感欠缺的，是他们的科学。”钱穆虽极力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但也承认中国传统缺乏科学的内容和地位，他主张中国要向西方学习科学：“科学亦是一种纯粹真理，并非只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做爪牙。中国人学习科学，并非即是学习富强侵袭。而且这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又身当其冲，中国人深感到中国自己传统的一套和平哲学与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实在对人类将来太有价值了，而中国的现状，又是太贫太弱，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而中国那套传统的文化理想，亦将无法广播于世界而为人类造幸福。中国在此两重观念下，始从内心真诚处发出一种觉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负最大使命之觉悟，此下的中国，必需急激的西方化，换辞言之，即是急激的科学化。而科学化了的中国，依然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使命里尽其责任，这几乎是成为目前中国人的一般见解了。”^{[12]34-35}在钱穆看来，中国要走向强大，必须向西方学习科学。学习科学促使中国强大，但其最终目的是要让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得到实现，从而为人类造福。这里，钱穆的言论显示了文化开放心态下的文化自信。

在学衡时代，学衡派文人重视文史的思想性、人文性，被学界视为南派，他们对胡适、傅斯年等所谓北派人士科学式地强调客观中立与细节考证的研究范式不喜欢、不认同。如缪凤林所强调的仍是传统族类观念与儒家的正统地位，而傅斯年等人则是站在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的基点上，去构建现代性的国家和学术观念。但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学衡派同人思想已有一些变化，《思想与时代》月刊上的文章已体现出对现代科学精神的肯定和对接，在传统学问之研究方面也是如此。萧璋《王念孙父子治学之精神与方法》一文是对清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做学问的方法和精神的探讨，萧文指出：“王氏治学之精神，在乎求是。”在萧璋看来，这种求是精神即与现代科学精神相通。在文章结尾之处他如此说：“今人治学，承继乾嘉，而又感受十九世纪以来欧西学者治古学之风气，较昔日更

为精密。以此标准，衡量王氏，则益见其价值之高也。”^[15]其以19世纪以来的科学治学范式为标准，充分肯定王氏治学之方法与精神，实际也是肯定了现代科学方法与精神的普适性。在《欧阳永叔治学之精神》一文中，缪钺特别推崇欧阳修对汉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他秉承的同样也是现代科学精神。这说明了缪钺对以科学为基础的“疑古学派”的研究范式是充分接纳的，也说明独立思考、不迷信传统权威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共识，在新旧文化研究中都得到认可^[16]。贺麟的《王安石的心学》一文则以西方哲学模式解读中国传统精神和理路，他认为王安石的心学出发点就是“建立自我”^[17]，其与新文化运动对个体解放、个体本位的强调高度契合。贺麟深得西学之精髓，他以西释中，给传统以现代解读，强调以心性坚守、对抗权威，限制专制，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肯定和认同。只是在具体论述中，他过于夸大了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高估了人性，对人之罪性还缺乏观照。

以上这些，都显示了《思想与时代》月刊学人对民主和科学的重视与认同，说明他们在这一层面与“五四新文化派”已达成了共识。

二 《思想与时代》月刊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与超越

《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对民主和科学的认同与重视与“五四新文化派”日趋一致，但他们也注意到了倡导民主与科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其中存在的科学滥用问题。由此，他们对日渐形成的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尤其是通过“科玄论战”，科学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此科学思想深入人心，这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及科学精神的普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一味追求科学，视科学万能，势必让科学主义泛滥，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早在学衡时代，学衡文人就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为思想资源，高举“人文主义”旗帜，提出要警惕科学的滥用：“今天，需要捍卫人文学科不受到自然科学的侵犯，正如曾经需要捍卫它们不受到神学的侵犯那样。”^[18]当然，在1920年代，中国还处于极为缺乏科学的阶段，学衡派对科学的警惕显得过于超前而不合时宜；但是，“经过1923年‘科玄论战’之后，虽然科学的含义受

到了限制,但科学的影响却更为深入人心。随着科技在教育、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开展,二三十年代中国成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19]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主义慢慢抬头,到1940年代,其势头越来越猛,知识分子不能不对此有所审视。

《思想与时代》月刊显然重视、认同科学,这与“五四新文化派”已形成某种默契,但他们秉承学衡理念,反对科学的滥用,反对科学主义,坚守人文价值,主张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因此,《思想与时代》月刊提出科学人文文化的主张,在承认自然科学价值的同时,也认同人文价值,并且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人文精神源泉,积极对其阐扬并从中汲取养料,以此达到科学技术与人文因素的相互渗透与平衡发展,实现刊物所追求的目标:“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思想与时代》月刊中坚人物张其昀治学一向主张史地结合、史哲结合、科学与人文结合。1941年,他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和第3期所发表的《论现代精神》和《论现代精神》(续)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张其昀认为:科学要与哲学结合,因为哲学为真善美之价值世界,为人类之最高追求。他说:“科学之范围终属有限,必须本于哲学爱智之态度,博辩之精神,穷揽宇宙之高深广大,进而窥查趋于智识之大实在。”显然,张其昀反对科学主义,反对科学万能论。在张其昀看来,西方代表科学,东方代表人文,同时他强调科学要与人文结合,中西结合正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一面继承本国之政治哲学,一面努力吸收西洋之科学,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于真正之创造。”因此,他认为,现代科学与阳明心学已有内通之处:“现代思潮循唯心论之方向,澎湃前进,此种趋向系凭依于现代科学实验之结果,而不得不加以肯定。”“现代科学与现代哲学均有人本主义之倾向,欲以人类心力克服环境,创造命运,而不致为物质环境与经济条件所束缚,故人本主义具有一种创造精神。”张其昀推崇康普顿的思想:“科学非仅以实验管与电子为尽其能事也,科学之任务又在人与事物之各得其所,以解决人生问题。”并指出:“康氏之说实为科学研究进一解,表示科学与哲学日趋接近。”^[20]总之,在张其昀看来,科学要与人文结合,这也

是他作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开山大师的一贯主张。

1943年,张其昀受邀赴美到哈佛大学讲学,期间接触到萨顿新人文主义。萨顿是世界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他试图弥合科学与人文日益严重的分裂,由此提出新人文主义思想。萨顿新人文主义包括统一性思想、科学的人性、重视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对宽容与仁爱的极度需要四个方面。萨顿新人文主义坚决反对科学主义,主张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与协调,视科学史研究为科学与人文的沟通桥梁。萨顿新人文主义思想集中于他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之中。萨顿新人文主义深得张其昀认同,其正是张氏一直寻求的理论资源,因此他在回国之际带回了《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也正是受萨顿新人文主义的启发和鼓舞所致。张其昀在《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复刊辞》中更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主张。为全面介绍和推广萨顿新人文主义思想,实现《思想与时代》月刊宗旨,张其昀特意邀请浙江大学数学系钱宝琮教授为《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一书撰写书评,该书评载于月刊第45期(1947年)的首要位置。在此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思想与时代》月刊设有专门的书评栏目,书评一般为当期最后一篇文章,而该期将钱宝琮这一书评作为期刊首篇文章,是为例外,由此可见月刊对该书评及萨顿新人文主义的重视程度。钱宝琮在该书评中,全面介绍了萨顿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点,他强调:“今世意见之冲突,莫甚于旧人文主义者与科学家之不能相容。旧人文主义者谓科学仅系专门技术,遂以维护精神事业自居。不知科学发展之速,于今为烈,对于人生之重要性必渐增加。将来一切科学知识及物质权力为科学家所把握,而教育事业仍操于旧人文主义者之手,二者分道扬镳,后果之恶劣将不堪设想。”“挽救之策莫如调和二者之间使能互助合作。人文主义之表现原在教育与文化,务求人类之至善,自当容纳一切正道之创作活动。人文主义当是一切事业之能增加人生文化价值者之总集合。各部分之工作者应互相了解,共济时艰,非任何一群人所能专利也。教育家须略具科学知识而能欣赏之,科学家须受历史训练而能后顾之忧,维护正义。”“新人文主义者,因同情于人类之创造活动,愿以其热忱促进人类文化,且以

感激国内景慕之心回顾既往。下学则温故而知新，上达则承先以启后。使当世学文者藉此以略知科学，学理者藉此以略知文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则岌岌可危之机械时代可以祛除，而光明正大之科学时代将代之而兴矣。”钱宝琮还结合当时中国科学史研究现状和他对数学史、天文学史研究的经历，提出了自己对中国科学史的期望：“欲求科学史之完善，此时尚非易事。所望国人有兴趣者多作专门学术史之整理工作，一则可以凑成一优良之本国文化史，一则可以校补世界文化史之疏漏，对于新人文主义者不无裨益也。”^[21]至此，萨顿新人文主义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共同成为学衡派同人的理论资源，为其追求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致力于科学人文化提供理论依据。

除上面张其昀、钱宝琮的文章外，其他学者也著文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和相通。洪谦《释学术》一文将学术视为“统一体”，借助中国传统话语系统来诠释科学的统一性，这与张其昀的思路相通^[22]；卢于道《贝纳儿〈科学之社会作用〉》一文在介绍贝纳儿《科学之社会作用》一书中探讨真正的科学精神，并提出科学要与个人自由、社会发展相协调^[23]；竺可桢《科学与社会》一文则特别强调科学应用于民生，而非战争，希望能以人类的道德标准约束科学的急功近利和滥用^[24]，等等。

从月刊的作者构成来看，月刊作者集中了当时诸多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其中不少是当时学界重量级的人物。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竺可桢、卢于道、钱宝琮、洪谦、任美镠、李四光、叶良辅等；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除6名核心社员外，还有冯友兰、熊十力、唐君毅、丰子恺、谢幼伟等。《思想与时代》月刊能集聚如此之多的重量级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持续几年在同一刊物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教育、文学等多方面展开讨论，的确体现了科学与人文沟通交融的追求，这在今天看来也极为难得。

反对科学主义，主张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与协调，是《思想与时代》月刊的重要论题，体现了其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我们当然不能把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潮与科学主义混为一谈^[25]，但也要看到，“五四新文化派”在对科学的倡扬之时，的确缺乏对科学主义的警惕，而且不论是同为五四之子的自由派，还是激进派，

他们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都同样缺席。反倒是对“五四新文化派”持有异议、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学衡派同人对科学主义保持了足够的警惕，进而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对科学与人文协调的主张和追求，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难得且极为珍贵的。

总之，《思想与时代》月刊与“五四新文化派”保持了互动交流，并有交融的趋势，其间，学衡派同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这些趋势和变化再次印证，学衡派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饶有意味的是，1943年，张其昀赴美讲学，专门拜访胡适，并把他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月刊送给胡适看。这说明张其昀很在乎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对《思想与时代》月刊的态度和反应，也说明他们很愿意与“五四新文化派”互动交流。不过，胡适对这一杂志评价不高，他曾经如此评价这本杂志：“此中很少好文章。”“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26]胡适对这份杂志有他的看法很正常，但现在看来，胡适的评价似乎并不公允，因为其遮蔽了《思想与时代》月刊更丰富的内容和价值。

从以上分析来看，《思想与时代》月刊较学衡时代的确发生了不少变化，其基于人文主义立场而展开的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对现代性的重要反思，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切合了时代的需求，但其的确缺乏对科学主义的警惕。实际上，科学主义的泛滥，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和信仰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其一就是“科学压倒启蒙”，遮蔽了科学所蕴含的自由批判精神，使本来是思想解放源泉的科学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霸权，甚至成为独断思想的助力，使民主成为梦幻；其二是弱化了“求真”科学精神本应有的内涵；其三是限制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使其中关注人的自由和解放、充满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救赎精神的内容被遮蔽^[27]。概言之，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对科学主义的反思批判极为难得、弥足珍贵，同时也显示出中国现代化推进的复杂面相：启蒙与反思启蒙、科

学与反思科学、民主和反思民主、现代性推进与现代性反思,杂糅并进,难解难分。

参考文献:

- [1] 沈卫威. “学衡派”谱系: 历史与叙事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7: 244.
- [2] 张其昀. 《思想与时代》复刊辞 [J]. 思想与时代, 1947(41): 1.
- [3] 钱穆. 鄞县张晓峰先生其昀行状 [J]. 传记文学, 1985(3): 30.
- [4] 张其昀. 张其昀先生文集: 第20册 [M].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9: 10841.
- [5] 李怡.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6): 150.
- [6] 王健. 探索与论争: 1916—1949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研究综论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4): 1-8.
- [7] 段怀清. 传统与现代性: 《思想与时代》文选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6.
- [8] 张荫麟. 论传统历史哲学 [J]. 思想与时代, 1943(19).
- [9] 贺麟.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J]. 思想与时代, 1941(1): 14.
- [10] 张其昀. 时代观念之认识 [J]. 思想与时代, 1941(10): 42.
- [11] 张其昀. 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 [J]. 思想与时代, 1941(1): 8.
- [12] 钱穆. 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 [J]. 思想与时代, 1944(32).
- [13] 卢于道. 科学与政治 [J]. 思想与时代, 1941(5): 35.
- [14] 缪钺. 论荀学 [J]. 思想与时代, 1944(36): 19.
- [15] 萧璋. 王念孙父子治学之精神与方法 [J]. 思想与时代, 1944(37): 11.
- [16] 缪钺. 欧阳永叔治学之精神 [J]. 思想与时代, 1945(40): 22-25.
- [17] 贺麟. 王安石的心学 [J]. 思想与时代, 1947(41): 9-12.
- [18] 欧文·白璧德, 理查德·M·甘博, 克雷斯·莱恩, 等. 人文主义: 全盘反思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20.
- [19] 段治文.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322-323.
- [20] 张其昀. 现代精神(续) [J]. 思想与时代, 1941(3): 44-46.
- [21] 钱宝琮. 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 [J]. 思想与时代, 1947(45): 2-3.
- [22] 洪谦. 释学术 [J]. 思想与时代, 1944(31): 35-39.
- [23] 卢于道. 贝纳儿《科学之社会作用》 [J]. 思想与时代, 1942(10): 47-52.
- [24] 竺可桢. 科学与社会 [J]. 思想与时代, 1943(24): 1-9.
- [25] 徐辉. 五四科学思潮与科学主义 [J]. 民主与科学, 1993(6): 28-30.
- [26] 胡适. 胡适全集: 第33卷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524.
- [27] 吴炜, 柳媛. 中国现代思想的科学化及其效应 [J]. 人文杂志, 2008(3): 27.

责任编辑: 黄声波